

原生家庭不幸福、被权贵羞辱、工作很普通

30岁前的孔子在干些什么

□ 吴鹏

9月28日是目前社会主流意见公认的孔子诞辰日,很多地方都会在这天举办一系列祭孔大典。圣人平生功业,如南宋朱熹所言,天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孔子并非生来就是后世流传画像上的那个长胡子老人,他也从青年时代走来。那时候的他虽然没有中年之后出任大司寇掌鲁国刑政、打击权贵三桓势力的惊心动魄,也没有周游列国、推广政治主张的艰难困苦,更没有修订六经、建立中华文化道统的辉煌功业,但他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已经生根发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担当亦已使命在肩。

并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按照当下的某些观念,孔子的原生家庭很成问题,属于高开低走类型。他祖上本是宋国王室,后家道中落迁至鲁国。父亲叔梁纥虽是没落贵族,但以勇猛善战闻名于诸侯之间;母亲颜徵在是叔梁纥的第二任妻子,比叔梁纥小40多岁,其家族是曲阜大姓,故孔子家庭应属当地的上流阶层。

在孔子之前,叔梁纥与前妻施氏育有9个女儿,和小妾育有一个有足疾的儿子孟皮,都不能承继香火。孔子是叔梁纥在60多岁上的老来得子,是整个家族的希望,本应有一个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幸福童年。

不幸的是,孔子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颜徵在为躲避与施氏的复杂家庭矛盾,带着3岁的孔子离开乡间老家,搬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居住。

虽然是单亲家庭,但母亲尽力用勤劳的双手给幼年的孔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根据孔子的天性因材施教。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幼年爱好与众不同,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不似一般儿童那样喜欢玩耍,而是爱好摆弄祭祀、宴会时用以摆放祭品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礼器,将其按照礼仪制度摆放,然后练习磕头行礼。

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是否通晓礼仪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据清人郑环《孔子世家考》,颜徵在观察到儿子在礼仪学习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就豫市礼器,以供嬉戏,用节省下来的钱财为孔子购买标准制式的礼器,让他学习礼仪制度,使之成为将来摆脱家庭地位下跌颓势、重返贵族阶层的阶梯。

被权贵当众羞辱

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10多年后,更大的打击来了。孔子十六岁时,母亲颜徵在因操劳过度,在30多岁的时候与世长辞。孔子严格按照礼仪料理母亲后事,将父母合葬在曲阜东部的防山,赢得周围人赞许。

世界上最疼爱孔子的那个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十六七岁的他要独立学习谋生。不久,生活就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母亲去世不



9月19日,《论语》主题展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幕。视觉中国供图

久,当时鲁国权势最大的贵族季孙氏,大宴宾席,请士及以上的所有贵族赴宴。孔子虽然当时还在为母亲要经戴孝,丧服未除,但考虑到自己作为闻名于诸侯的武士叔梁纥之子,有资格参加这次鲁国贵族聚会,且有可能在聚会上重振孔家家声,就欣然前往。

不料还没见到季孙氏,孔子就被季氏家臣阳虎在季家门口拦下。阳虎颐指气使,极为傲慢地呵斥孔子,季氏豨子,非敢豨子也,季家今天宴请贵族名流,并不是要请你孔子。阳虎此话,等于是代表季家将孔子开除出贵族行列。孔子连最低等的士的资格都不被承认,由是退,转身离开季氏家门。

阳虎的傲慢杀不死孔子,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强大。重振家声的使命在前方召唤,而眼下最紧要的是谋生。

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

据《论语·子罕》,孔子成名后,负责国君宫廷事务的太宰曾对孔子弟子子贡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简直就是个圣人,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技能?子贡为神化老师,回答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这都是上天安排孔子成为圣人,才让他拥有超凡技能。

孔子听闻子贡回答,不以为然,没有自我神化,而是道出实情,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都是当年生活所迫,每一项技能都是一段辛酸却励志的往事。

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孟子·万章下》,当年贫困的孔子尽管被季家羞辱,但为了谋生也必须忍辱负重,向季家低头,毕竟季家几乎垄断了鲁国大部分产业。孔子曾经为季氏做过委吏,职责是管理仓库,料量升斗,会计出纳。孔子将一笔笔收支账目都计算、登记得清清楚楚,会计当而已矣。孔子后来又做司职吏,即乘田,管理牛羊畜牧事务。孔子晨夕饲养,悉心料理,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将牛羊喂养得膘肥体壮。

孔子深知,无论是管理仓库还是畜牧牛羊,都只能解决眼下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还得掌握更多技艺,点开更多技能树,以求进一步发展。

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体系和政治社交礼仪中,士要具备六艺,即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计算)六种技艺。孔子在幼年时期就已经打下礼仪的基础,管理仓库时又发展了数的技艺,后来又通过自学和向人求教,相继掌握了其他四艺。

尽管六艺俱通,孔子却相当谦虚。据《论语·子罕》,孔子名满天下后,有个叫达巷党的地方的人听闻他六艺皆精,赞美国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是博学通才,不能用专家这一名号限制了他的天才。孔子听闻,对弟子门人言道,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为师哪有什么本事,会射箭吗,能驾车吗,只是懂一点驾驶技术罢了。

做君子儒,不随波逐流

不论后来的孔子如何谦虚低调,他在青年时期的才气已经逐渐为人所知。如此才子,自然要有佳人做伴。据《孔子家语》,孔子19岁时,迎娶宋元官氏为妻。妻子家族和孔家一样,都是早年由宋国迁至鲁国,故云宋元官氏。

当时孔子才气已经名满鲁国,国君亦有耳闻。孔子婚后一年,大约20岁左右,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鲁国国君听闻孔子喜得贵子,派人送上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便给儿子起名字鲤,字伯鱼,以答谢国君厚赐赏识。

国君器重,国人看重,孔子前程一片大好之时,却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据《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即孔子27岁的那年秋天,附属于鲁国的小国郑国郊子来朝见鲁国国君。鲁国大夫昭子向郊子请教上古少昊氏时期的官制情况,郊子详细地回答了来龙去脉。孔子闻之,立即见于郊子而学之,向他学习上古职官制度变迁历史。学成后,孔子对人言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

夷,犹信。我经常听人说王权衰落,负责文学术的官员流散四方,我以前还不信,今天算是亲眼所见,亲耳验证。

孔子眼见文化日衰、学术日败,决心扭转这种颓势。他15岁即立志于学,但在这之前所学只是为稻粱谋、为一己一家生存计,正如他后来对学生子夏所言,是为小人儒,学习六艺只是为谋生进身之途。在此之后,孔子要做君子儒,将对六艺具体技巧的学习,上升到探求其渊源流变、是非得失和意义所在,以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他向鲁国乐官师襄学琴,从《文王操》乐曲中体察周文王的为人风貌和济世情怀。大同东边连接上谷(河北),可以到华北平原的北部;南边可以直达太原(并州、恒州),南下中原;西边以黄河为界,向北则可以控制沙漠地区。所以,大同处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要害,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往往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相争夺的焦点地区。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所著的《读史方輿记要》里介绍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疆之要害。大同东边连接上谷(河北),可以到华北平原的北部;南边可以直达太原(并州、恒州),南下中原;西边以黄河为界,向北则可以控制沙漠地区。所以,大同处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要害,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往往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相争夺的焦点地区。

孔子听后不以为意,言道:是礼也。遇事不懂就问才是礼,我的做法才合乎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问态度。当然,也有钱穆等学者认为这段对话有另外一层意思,是孔子用反问语气讽刺鲁国太多很多祭祀活动不符合真正的礼仪,用故意向别人请教的方式,唤醒人们对太庙种种非礼行为的注意。

一些学者还认为,孔子在青年时,还曾到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学习周礼和古文獻。鲁国国君赐给孔子一个童仆、一辆车、两匹马,资助他千里赴洛。孔子在洛阳还与老子相会,探讨学术。当然,孔子赴洛阳的具体年龄,以及是否真的见到老子,在学术界也都有争议。

创办平民教育,抱定一生志向

孔子在求学的过程中推己及人,开始关心底层百姓的教育问题。他作为最低等的贵族士,遇有疑问可向郊子、师襄、老子等人请教解惑,但在当时,学在官府,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教育格局中,平民子弟并无接受教育的机会。

30岁的孔子决心改变这种不公平局面,他开始创办私学,授徒设教,以有教无类的理念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打破了日渐没落的贵族在教育问题上建立的护城河,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家,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如《论语·述而》所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送上一束干肉的薄礼作为学费,都可拜入孔子门下接受教育。创办平民教育的孔子,抱定一生志向,教人立身之道,培育爱国情怀,子路、颜路、曾点等早期弟子相继投入而来。鲁国贵族孟僖子也派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而后他们求学。

前方有星辰,眼中有光芒,心中有仁爱,脚下有长路。三十而立,逐步迈向40岁门楣的青年孔子已然不惑,已经有了面对未来一切未知、责难、不解的底气与坦然,即将如日月之明(北宋程颢语),照亮万古长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城事

□ 程遂营

一提到大同这座城市,很多人往往联想到我国古代一个流行词——天下大同。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其标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公平,民族和睦,天下为公。古往今来,这种理想始终鼓舞着无数志士仁人不懈追求。

在大同的城市史上,孝文帝改革就是个典型案例。大同古称平城、云州、云中等,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0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时期。大同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与山西黄土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有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成为古代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通道。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所著的《读史方輿记要》里介绍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疆之要害。大同东边连接上谷(河北),可以到华北平原的北部;南边可以直达太原(并州、恒州),南下中原;西边以黄河为界,向北则可以控制沙漠地区。所以,大同处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要害,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往往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相争夺的焦点地区。

东汉、魏晋时期,中原混战,无暇也无力北顾,鲜卑族趁机占领大同盆地,把它作为进军中原的跳板和桥头堡。鲜卑拓跋部本属于东胡一支,世居大兴安岭附近,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建兴元年(313),鲜卑拓跋部建立政权,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平城为南都,天兴元年(398),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七月,把都城从盛乐正式迁到平城(即大同),之后,拓跋珪及其后代利用平城独特的战略地位,征服高车、柔然、西燕以及鲜卑部的慕容部等周边诸游牧部落,然后,又以平城为根据地,派大军南下中原,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基本统一北方。平城也成为我国北部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作为北魏都城长达96年。

但到了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位时,却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把都城迁到中原地区的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平城位于山西北部,高山大河环绕,土地瘠薄,交通不便。孝文帝统治时,平城人口已近百万,粮食和物资供应十分艰难;其次,平城位置过于靠北,不利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也不利于北魏汉化政策的推行。

历史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把向南发展,乃至统治农耕文明地区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南进的过程,一般都走了三步棋:第一步,实力不够强大时,南侵犯塞,掠夺农耕地区的财物和人口;第二步,随着实力进一步强大,夺占和统治农耕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第三步,实力足够强大时,推翻中原王朝,入主中原。

鲜卑拓跋部已经成功地走完了这三步棋,实现了入主中原的目标。但是,平城毕竟远离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从长远来讲,既不利于就近吸取农耕文化的精华,又不利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持久统治。除了以上诸多因素,平城还给孝文帝留下了一些苦涩的回忆。在孝文帝的身边,有一位铁腕女人——冯太后,她并非孝文帝的亲祖母,她曾逼迫孝文帝的父亲退位,孝文帝宠妃林氏的死也与她有关。对于孝文帝而言,平城哺育了他,把他养大成人,但平城又是令他伤心的地方,这或许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促成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这年,孝文帝24岁。虽然冯太后不在了,但她实际掌握北魏大权近30年,在鲜卑贵族中培植了强大的实力。作为外戚,冯氏家族仍然手握大权,盘根错节,实际把握了北魏大权。孝文帝迁都,也有打算避开冯氏势力范围——平城,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北魏政权新格局的意图。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正式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然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主要内容是:汉化,称孝文帝改革。改革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不仅改变了鲜卑族的命运,还改变了大同这座城市的命运。

北魏曾经以大同和洛阳为中心,统治我国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促进了这一区域饮食、服饰、风俗、宗教等文化的大交流。比如,北魏皇室崇信佛教,北魏统治时期,我国北方地区佛教广为传播,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佛教石窟。著名的佛教寺院如山西五台山寺庙群、嵩山少林寺,都始建于北魏,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我国四大佛教石窟也都始凿或兴于北魏时期。

北魏定都大同长达百年,后来,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又以大同为陪都长达数百年。建都大同的优势很明显:形势险要,是进攻中原的前沿阵地,又背倚蒙古草原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但劣势也很明显,这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粮食和物资供应不足。在孝文帝去世短短30多年之后(公元534年),北魏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短命而亡,这就意味着,建都在农耕文明的腹地,远离游牧民族的大后方,必然失去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同用自己的成败存亡为北京做了百年的实验,为北京建都提供了样板。

对于游牧民族来讲,建都北京兼有大同和洛阳的双重优势,又避免了两座城市的不足。首先,北京背倚辽阔的蒙古大草原和东北地区,有充足的回旋余地;其次,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和北方地区的咽喉要道,交通十分便利;再者,通过大运河可以很方便地把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粮食和物资运往北京,满足都城的需求。所以,北京就成了金、元和清朝都城的不二选择,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无论如何,孝文帝出生在大同,生长在大同,他的改革思想也定型于大同,而孝文帝改革的目标也是为了天下大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就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谐、天下一家

的城市,它的名字也必将为中华文明史永久铭记。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主讲人)



山西大同,古城上月如银盘。视觉中国供图

千年岳麓书院为什么行



岳麓书院。视觉中国供图

求是等故事核。而在此基础上,《岳麓书院》还有教育与思想文化两条隐含的逻辑线。

从教育角度,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演变的亲历者,还是现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者。

从北宋开始,岳麓书院成为湖南最高学府,位列潭州(长沙)州学之上,以后历代办学,它一般都居于州学之上。从全国范围来说,自北宋开始,岳麓书院亦占据了全国四大书院之中最稳妥的那把交椅,不管四大书院的说法有几种,它始终是公认的四大书院之一。

近代书院改制,岳麓书院是亲历者。自王先谦1894年主讲岳麓书院以来,教育改革的步伐就没有停过,尽管它有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还是没能挣脱清末几所书院改制的大潮,以西式的教育组织方式改成了高等学堂。但这所书院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几经转折,成为现代高等教育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岳麓书院又在传统书院教育的基础上,借助现代高校的教育资源,成功转型为现代新型书院。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说,无论两宋理学、明

代心学、清代经学,还是近代革命文化、现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岳麓书院都是参与者,有时还是引领者。

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重镇与朱张学统的源流。明代自王阳明访院之后,100多年间,阳明后学有十几人陆续登坛文质,传播王学。清代,岳麓书院有罗典、王文清、欧阳厚均、王先谦等经学名家主讲,并专门创建了通经致用的湘水校经堂,左宗棠、郭嵩焘等皆肄业于此。

这个院落落在千年岁月中屡毁屡建,《岳麓书院》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反复再现了书院重建的历史。当宋真宗的匾额在荒草丛中被重新发现,再次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上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那块匾额被挂上去了,更是书院的文脉又重新接续起来了,甚至是中华文明的脊梁又挺起来了。

那些伫立在破败院落前、手拿建筑图纸、孜孜不倦的建设者,他们修建的不仅仅是这个供人栖身的房屋,他们在铸就文化,同时也以自身为基,创设指引文明方向的灯塔,是的,他们自身就是灯塔。镜头里书院六君子堂的先辈们,就是书院成十上百成百上千个建设

者的代表。

仔细看每一集的主要人物:第一集张栻,第二集张元忬,第三集吴道行、王船山,第四集郭嵩焘,第五集王先谦,第六集杨昌济、毛泽东。我们会发现,书院的传承者们构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绵长气脉。

张元忬是张栻弟弟张杓的直系后裔,又是明代书院院长吴道行的老师。吴道行则是张栻弟子吴猎的后裔,又是王船山的老师。郭嵩焘是王船山的坚定追随者,为其迈入文庙圣域奔波多年,而王先谦又是郭嵩焘的忘年交。杨昌济1898年在书院读书时,王先谦任书院院长,理论上就是王山长的学生,毛泽东又是杨昌济的学生。

千百年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聚集在书院,奔走呐喊,奋勇前行,书院就不可能有千年底蕴的沉淀,也不可能有什么楚材斯盛、的璀璨。

从第四集《经世》到第六集《求是》,我们要回应当下的两个重要文化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坚守我们的文化自信。

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至少有三代人有着不同的应对态度和方法。第一代人可以包括魏源、曾国藩和郭嵩焘等,他们提出了师夷兴洋务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是此时的主题。

第二代人以王先谦为主,他在提出学习时务的同时,也开始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反思西方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事实上这个曾被贴着保守卫道、标签的学者,事实上在坚守自我文化精神和反思外来文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的问题上,超越了激进与保守、维新与守旧的藩篱。

第三代人以杨昌济和毛泽东为主,这一代人具备了融会中西的学术基础和现实条件。杨昌济认为,要融汇中西,必须有扎实的国文、国学功底,换句话说,中学才是融会的根基。他同时也延续了王先谦关于是否符合国情的观点。

毛泽东在蔡和森们远赴西洋求学的时候,留下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在艰难的探索中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主义,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正确方法,正是悬挂在岳麓书院讲堂前檐的匾额——实事求是的寓意所在。(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纪录片《岳麓书院》学术撰稿)

中国书院

中国书院



□ 郑明星

岳麓书院,在今日大众心中可能是一座古建筑、一处历史旅游景点。而绵延千年的它,更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的代表,反映的是在一座幽静闲适的院落中,一群读书人围绕着书展开的、万象纷呈的教育教学和思想对话。

千年庭院,潇湘洙泗,弦歌不绝。作为我国书院文化的典型代表,岳麓书院有怎样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制度,培养怎样的人才、传播何种思想文化。这是9月22日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开播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岳麓书院》想要告诉大家的。该片通过源流、正脉、传道、经世、新变、求是6集,其实要回答的是两个问题:岳麓书院究竟是什么、这座院落绵延千年为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岳麓书院》以五代期间二僧之创山为始,历来张理学、王阳明心学、王夫之船山学之,至曾左彭胡,杨昌济、毛泽东,再到当下,以人为线,应照爱国、济民、经世、